

歷史性・大陸行

李永得
徐璐 著

訪

PEKING: CHINA-TAIWAN; PEKING, CHINA; SEPT. 15--Taiwanese journalists Hsu Lu (L.) and Li Yung-teh (R) talk to reporters at Peking's airport after their arrival early today as one of their hosts from the China News Service takes notes. They are the first Taiwanese journalists to openly visit the mainland since 1949.
REUTERS en/Edward Wachtrieb 1987.



中國大陸探實記



歷史性・大陸行

作者：李永得／徐璐

策劃：自立晚報

主編：文化出版部

美術設計：文化出版部設計小組

出版：自立晚報

台北市濟南路二段十五號

電話：(〇二) 三五一九六一轉文化出版部

郵撥：〇〇〇三一八〇一一號自立晚報社帳戶

登記號：局版臺製報字〇〇二三號

電腦排版：自立晚報電腦檢排房

照相打字：名冠照相打字公司

印刷：松霖彩色印刷公司

定價：一一〇元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

三版：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

《裝訂錯誤或污損負責調換》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歷史性・大陸行

李永得／徐
璐

著

目錄

◎序

5 人道與公理

記自立晚報採訪大陸的決策過程

吳豐山

10 歷史上宏偉的一頁
15 採訪後記

陳國祥

李永得／徐璐

◎大陸印象

34 政治的北京，歷史的北京

北京印象

42 一首美的古詩

杭州西湖遊記

46 領導全中國的廣州
55 文化的相似，政治的對峙

廈門之行

59 孤寂清冷的東山「寡婦村」

64 我們叩開大陸之門

69 踏上大陸國土百感交集

74 擺出笑臉迎探親

78 走上不歸路的流亡者

85 在天羅地網中採訪

90 中共經濟改革困難重重

96 統戰拉遠兩岸人民的距離

100 大陸的「台灣熱」

105 中共對香港、日本、台灣的如意算盤

109 我們對開放大陸探親的省思

◎附錄

114 中共對兩記者採訪的反應和決策內幕
118 專訪方勵之

——「讓中共、台灣、香港三家來競爭」

序

人道與公理

——記自立晚報採訪大陸的決策過程

一、

根據個人備忘錄，七十六年二月間，我首度向自立晚報主力幹部提出採訪中國大陸的見解。

當時我指出，在人類居住的這個地球上，中國大陸與台灣最近，却因政治隔絕，變得咫尺天涯，這不合台灣的長遠利益。雖然有不少人已採訪過大陸，可是一個外國人或一個居住在外國的中國人，他們看待事物的出發點不會跟我們完全一樣，因此參考性有其極限。

雖然提出了見解，但並未落實；因為人很

渺小，大的環境沒有變，小我的發揮必受牽制。

到了八月，執政黨開放大陸探親之說，已甚囂塵上。九月初，根據各方面消息綜合研判，執政黨開放探親的大方針已完全敲定，只待擬訂細節。

二、

顯然，一種新的情境已來臨。

作爲一個報人，此時我自然會想到報人的使命；

作爲一個經營者，我自然會想到事業的競爭；

作爲一個善良國民，我也自然會考慮相關法令……

然後，我作下了派遣的決定。

我與總編輯陳國祥說明我的思考結論，他頗爲興奮。本報的當家攝影記者楊永智和經濟問題記者王克敬被決定爲採訪大陸的人選。他們兩人立即知道了派令，並被要求在最短時間內辦好出國手續，從香港進入我國大陸。

隔了兩天，我被告之，楊王二人要二週後才能辦好手續。雖然出國手續不是我能包辦的，但却顯然與我的期望不合。

三個原因，使李永得和徐璐成爲前往中國大陸採訪的第一批中華民國記者：一個是他們的能力；一個是他們馬上可以出國前往東京；第三個是我們自立晚報行事一向快速，權責也劃分得很清楚。

我同時決定，九月十一日李徐二人出國後才向發行人吳三連先生和董事長許金德先生報告。

這樣決定的原因是，他們一直充分信任我，而且我作爲部屬晚輩、作爲社長，理當由我負起將來可能發生的責任。

三、

我與陳國祥、李永得、徐璐四人曾在九月十日深夜詳細討論宣佈大陸採訪的時宜問題，當時決定，等人到了北平才把派遣之事公開。

九月十一日清晨，我決定改變前一天的決定。主要的理由是：我重新推敲的結果，認爲一開始就坦坦蕩蕩地把一切都暴露陽光下，最符合報社和李徐二人的利益。

然後是，上午十時，我拿到了國民大會開給我的中正機場通行證。十時卅分，我與李徐二人離開報社上高速公路。十二時二十分李徐通過出國關卡，我打電話給陳國祥，告訴他「到目前爲止，一切順利」。下午一時，機門關上，我打電話給陳國祥說「已順利上機，請照預定換版發稿。」

在等候飛機前，我們三人曾到餐廳吃午

飯，李徐二人狀至泰然，頻說「我們正在寫歷史」。回台北的路上，我一直想着這句話。

四、

九月十一日是禮拜五，十二日是禮拜六。

我平時沒有休假，偶而停止工作都是很久以前就安排的。大約半個月前，幾個台北的朋友說好到我家鄉台南縣作兩日休閒。儘管十一日晚上，整個消息已轟傳國內外，官方也由新聞局和境管處發表了兩個聲明，我認為似乎沒有改變南下既定行程的必要。

於是我於禮拜六上午九時離開台北，禮拜天傍晚回到內湖的家。

五、

九月十四日星期一，我像平日一樣，一早就抵達報社。九時許，我被通知是否於十時四十分到來來飯店與某大員見面？我準時赴約。該大員我素所敬重，也頗有情誼。他告訴我，事無大礙，但必須妥善處理。我認為各項說詞都很合理。

吳豐山親自「護駕」至機場



當天下午二時二十分，我拜會新聞局長邵玉銘；照中國規矩，我必須這樣做。同樣是照中國規矩，我向他報告我們的決策依據；邵局長那天看起來很認真，要副局長張佐為

先生把我說的話筆記下來。

因此我必須把我說的話也在此重覆一次，我說：

「政府已原則決定開放大陸探親，做爲一個新聞事業體，我們有義務爲讀者探路，以爲服務。這是新聞事業的職責。同時，我們自立晚報也一直認爲我們必須『建設台灣、心懷大陸、放眼世界』。」

「我們的決定，新聞局不以爲然，這是可以理解的，換成我是新聞局長，也許我也會發表同樣的聲明。不過，究竟我們是否適宜把前往我國大陸視爲出國，還要請邵局長多加推敲。如果您們最後決定依新聞記者出國辦法第十五條——召回，不召回則在被派遣人員回國前不得再派人，以及以國安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四款『得』限制再出境的規定來處分，我願表示尊重。」

六、

當天，李徐二人取得大陸的旅行證，於下午五時搭機經上海前往北平。

東京、香港、新加坡這三個地方的新聞媒體，對李徐二人的歷史性大陸行作持續性的大幅報導。幾家國際通訊社的電訊也拍發不停，於是台灣的新聞同業開始醞釀微妙的反應。

另一方面，國內民間爆發了幾乎是一面倒的支持熱潮。

又另一方面，開放大陸探親的幅度，在國民黨內部發生了很大的爭論。

這些事情攪在一起，經驗告訴我：原本可以比較單純的一件事，現在已經開始複雜化了。

國民黨中常會上，王惕吾和曹聖芬主張要嚴辦自立晚報，余紀忠反其道而行。我每天收到的一大堆支持信函中，開始包括三五張不是讀者投書的投書。顯然在大衆叫好的同時，有些人硬非叫壞不可了。

七、

九月廿七日，李徐二人在我的返國訓令三度變更後，從廈門經由香港返抵台北。在僑

福樓的慶功宴上，七點三十分的第一則電視新聞——吳豐山、李永得、徐璐被新聞局依刑法第二一四條偽造公文書印文罪嫌逕爲告發，移該地檢處法辦。

動用刑法完全超出我原先的料想之外。對新聞局以法律爲政治工具，我深不以爲然。

在發表九月廿八日的聲明以前，我的整個考慮內涵是這樣的：

一、新聞局的作爲必將引起國內外的嚴重注目，作爲一個報人，我必須保護我服務的報館和同仁；作爲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我却又必須同時保護我的國家。

二、國內的新聞同業不太可能與我們站在同一嚴正的立場上，因此我們只能靠自己。新聞自由是文明國家的共識，也是國際人權宣言第十九條明白宣示的人類信念，但非必要最好不要訴之國際。

三、我們必須好好的打官司，但假使硬被羅織，恐怕也只好「從容作禁囚」。

李徐二人及社內主力幹部都同意我這些觀

點，於是我發表了九月廿八日的聲明。

八、

聲援函電在其後一個禮拜中，大規模的湧入。雜誌界認爲我們被移請法辦是最好的封面專題。國際關切也開始到來。事情正逐漸在擴大之中。

妙的是，居然沒有人相信我們三人會被判刑。

過了幾天，報上消息說，張瑞楠先生是主辦檢察官。十月十三日報上消息先報導，十九日下午二時半將開第一次偵察庭。我們請的律師是前最高法院院長錢國成，外加我的三個好朋友蘇貞昌、周燦雄、李聖隆。

九、

我顯然不可能在這裏記載宣判的結果，就好像現在看不完整自立晚報採訪中國大陸的眞正影響一般。

不過，有一件事情是我確實知道的——那就是，人道和公理將會站在自立晚報這一邊。

歷史上宏偉的一頁

陳國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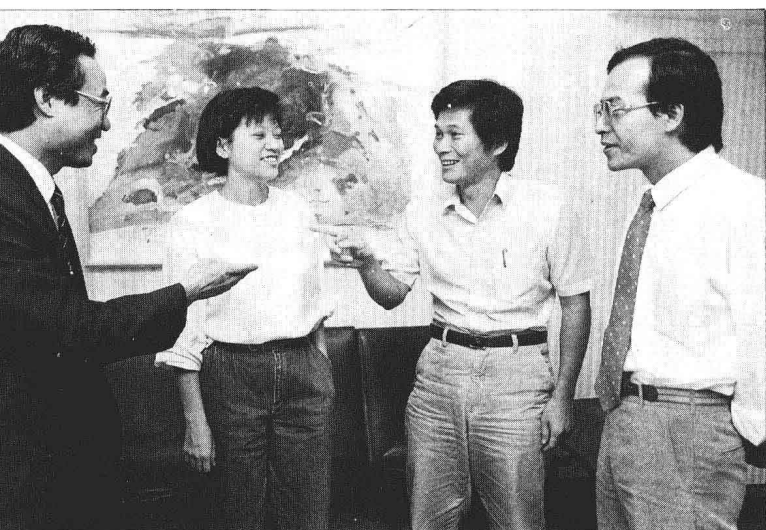
今年以來，執政當局採取一連串政治開放措施後，進而研擬開放民衆赴大陸探親並寬容海峽兩岸進行各類民間活動，促使台灣與大陸間非官方關係開始解凍。在此氛圍中，台灣地區新聞記者前往大陸採訪，成爲新聞界普遍的夢想，許多記者躍躍欲動，一些新聞機構甚至做好準備，希望槍聲一響，馬上奔赴大陸。

大家都想拔得頭籌，結果，自立晚報搶了第一。我們創造了歷史。這部歷史不僅是一個先驅性的紀錄而已，更是扣動兩岸關係新發展的板機。本報發布派兩位記者前往大陸採訪的新聞中，有一句話：「他們跨出的一

小步，將帶動歷史向前邁進一大步。」誠非虛言。

跨出這一小步，在手續上和程途上極其便捷，但要下達決心，却是難上加難。我們搶第一的成功關鍵，在於「膽識」二字。

在我接任總編輯第二天，社長就跟我說，現在派記者到大陸採訪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們可以考慮找一位在海外的自立晚報記者去大陸採訪。過了幾天，執政當局研擬開放民衆赴大陸探親的政策獲得證實，社長改變主意，認爲可以派在國內的記者以探親名義進入大陸採訪。在專欄組副主任王克敬和攝影小組召集人楊永智趕辦手續之際，一些報紙



行前社長殷殷叮囑

籌謀此事的傳聞甚囂塵上，而政府開放探親的政策也已箭在弦上，社長認為，根本可以派記者直接到大陸去採訪；九月九日上午九時，社長作了馬上派記者以最快速度進入大

陸採訪的決定。當時的決定是：「李永得和徐璐今天辦出境手續，明天動身，後天進入大陸。」

十一日早上，社長找我作最後商量，我們決定，二記者一上飛機，我們就發佈新聞。兩記者一登機就發佈消息，有幾個好處：①不會事前走漏消息，官方無法阻撓行程；②消息的發佈掌握在手中，完全操之在己；③到東京中共「大使館」辦入大陸手續後，消息會走漏，若由其他新聞媒體報導，將予人偷偷摸摸之感；④可立即造成聲勢，有利報業競爭，且可使中共當局不便拒絕；⑤予人堂堂正正之感。

和社長談妥這個決定後，我回到編輯部，馬上通知廣告組，第一版抽掉一個外報頭廣告，以便有充分的篇幅處理這則新聞。然後，我埋頭寫新聞，社長則寫聲明。十點鐘，聲明和新聞備妥，社長、我及二記者在社長室合影。

十二點廿分，社長從機場打電話給我說，

到目前爲止，一切順利。我回答：「我現在開始作業。」我約編輯主任和總領班到發行人辦公室秘密作業，並交待廠長印製注意事項。當天，恰好是我兒子五週歲生日，我和內人及父母親約好在一家西餐廳給他慶生，他們一再打電話催我趕快去，我說今天發生重大新聞，必須晚到。我全程督導檢排作業，看完第三次版大樣後，趕到那家西餐廳，他們已經吃飽，等著切蛋糕，我跟兒子說：「爸爸今天送給你一份最有紀念價值的生日禮物。」他一臉茫然。

兩記者赴大陸採訪的消息公諸於世後，自立晚報頓然成爲新聞舞台上的主角。李永得和徐璐是男女主角，社長是編劇兼導演，我則是執行編導。兩記者進入大陸後，由於和報社之間聯繫不便，加上情況陌生，必須隨機反應，所以兩位記者必須自編、自導、自演。社長、我和兩記者在編、導及演中，各有職份，必須搭配無間，恰到好處。這是一齣全新的戲，無經驗可循，而且觀眾極夥，

成份極雜，既不容有差錯，又需滿足各方欲求，所以演起來備感艱辛。

當天晚上，我趕到社長住處，協助吳太太應付各方的詢問及關切。我應付的第一個問題，是合衆國際社台北分社主任蕭樹倫問我：「新聞局已經發表聲明，命令自立晚報召回記者，你們召不召回？」我當下回答：「到目前爲止，我們沒有召回記者的計劃。」，「因爲我們認爲，派記者到大陸採訪和政府的法令並無衝突之處。」這個立場成爲本報對政府聲明的第一個堅定反應。

我在未向社長請示前敢於作此答覆，主要是因爲我們事先研究過，沒有任何法律禁止新聞記者到大陸採訪，而且此舉和政府的大陸政策趨向並無衝突，頂多祇是走在政策前頭一點。我們無畏無懼，既已起步，就要義無反顧地堅持到底。

而且，我們有一個心情：兩記者一出國門，這件事就成爲自立晚報和政府共同的問題，我們要保護自立晚報的尊嚴，也要顧全

政府的利益。如果我們召回記者，不但自立晚報顏面全失，政府壓迫新聞自由的醜態也將被世人嘲笑。因此，後來兩記者拿到大陸旅行證，準備進入大陸之前，國內外新聞媒體再問我要不要召回記者時，我一律答稱：「絕不召回，因為我們不能讓自立晚報和我們的政府在全世界人前面抬不起頭來。」

兩位記者進入大陸後，由於諸多考慮，我們數度通知他們改變採訪日程，九月十八日那天，李永得公開表示，將縮短採訪日程，提前於廿四日回台，不料引起香港及外國新聞媒體的猜測，一致認定是因為自立晚報受國民黨強大壓力，不得不提前回來。當天下午，我接到十幾個中外新聞機構的查詢，問我是不是有這回事。我們爲了顧全政府及自立晚報的顏面，堅決否認此說，表示是因為兩記者被中外記者包圍採訪，備受干擾，無法順利進行採訪工作，而且每日睡眠不足，身心俱疲，遂自行決定縮短訪問行程。我們並且強調：「本報已經訓令二記者完成原訂

採訪計劃，不可提前回來。」這個說法粉碎一切不利於政府及本報的揣測。

對於新聞局數度聲稱將對自立晚報「依法處理」，我們也抱持「這是自立晚報和政府共同的事」的態度，體諒政府有其立場，法令有其尊嚴；我們一再表示，祇要政府確是依「法」處理，我們謹表接受。如果不是新聞局動用刑法二一四條羅織我們「偽造文書罪」，我們是不會採取抗爭性行動的。事實上，兩位記者廿七日回來前，我們預先寫好一篇聲明，姿態很低，措辭溫和；對於政府將「依法處理」，我們表示「謹表接受」。然而，新聞局不識大體，竟然動用刑法羅織，我們祇好提高姿態，依法據理抗爭。政府有政府的尊嚴和立場，我們也有我們的尊嚴和立場，當政府反應過度，侵犯到我們的尊嚴和立場時，我們別無選擇，祇有與其抗爭一途。

事實上，本報派記者到大陸採訪，絕對有利於國家整體利益，姑且不說此舉對開展海

峽兩岸民間交流關係的突破性效果，亦不論其對世人展現的台灣新聞自由形象，光以兩記者在大陸的言行和所作的報導而論，即是鮮活的展現了在台灣成長的年輕新聞記者，不帶包袱，不受束縛，對大陸社會和統一問題的自然而客觀的感受與理解。他們的言行和報導出自一家無黨無派而自主客觀的報紙，其所產生的國際國內傳播效果是何等宏大！政府當局不知領受，竟而動法羅幟，不諳世事至此，令人失望透頂！

誠如香港「百姓」雜誌所說：「李永得、徐璐是生於台灣，長於台灣的記者，對於大陸的印象，完全是來自新聞報導或他人口中，因此這趟大陸之行，是在沒有歷史包袱的心情下成行。以自立晚報的風格來說，一般都認為他們的觀察應該是公正客觀的。」

「百姓」還說：「李永得、徐璐在採訪行程中，曾因對中共政權三十多年的成果提出嚴厲批判，致與一名中共記者發生衝突，這對中共而言固然極無面子，但台灣的執政當

局却不會把握這個正面宣傳的好機會，反而固執地把李、徐移送法辦，更荒唐的是，李、徐回國後，調查局竟然詢問二人：有否受人託付任務。台灣『恐共、懼共』的心態，竟至如此，令人為國民黨固步自封的觀念，嘆息驚訝。」

兩位記者到大陸採訪的歷史性影響必然極其深遠，目前尚難準確評估，一位政治評論家對其效果下了三點註解：①它刺激台灣當局對大陸政策的明朗化，也暴露國民黨內保守分子的落伍心態，對整個台灣政局，有着正面的衝擊。②讓台灣的反對勢力，尤其被認為有台灣獨立傾向的台灣自決論者，能進一步考慮到對大陸政策的重要性。③讓台灣民衆、大陸同胞都能更明確瞭解對方的現況，對於解決台灣問題，不啻是一個出發點。這個評估或許有過與不及之處，但至少有其參考價值。我堅信，公道自在人心、自在歷史；自立晚報寫的這部歷史，將在中國和台灣的歷史上留下永不磨滅的宏偉一頁！

採訪後記

李永得
徐璐

從一名採訪新聞的記者成為被記者採訪的新聞對象，我們雖然在新聞史上完成一次歷史性的任務，但是從新聞專業領域來自我評價，我們對此趟的採訪成果是不滿意的。

大陸十四天的見聞只能算是對中國大陸的驚鴻一瞥，連走馬看花都談不上，尤其在海峽兩岸長期的資訊封閉下，倒反而像是「瞎子摸象」。但是我們仍然在報紙上「佔用」了很多篇幅，甚至還要出版成書，從一個專業的要求來看，這真是教人出冷汗的事。但是，我們仍然寫了、出版了，因為在我們一陣心虛之中，我們仍必須為這卅八年來第一次的大陸之行負社會責任，並向讀者交出我

們的「成績單」，同時，我們也認為雖然只是驚鴻一瞥，但把那一瞥時所見、所聞、所感記錄下來，多少仍有助於讀者更真實（雖不是完整）的瞭解我國大陸的現況。

因為，它是一個真實的捕捉，一個完完全全透過台灣記者的雙眼所做的直接捕捉，而不是透過外國記者的筆和鏡頭的折射。

在我們的文章中，我們用了很多「落後」的字眼和批判的文句，那並不是我們的主觀成見，而是對一個事實的描述以及在根深蒂固的民主、自由的信仰下，一種直接的反應。一個更深入或更寬廣的全面了解，需要時間，也需要突破很多禁忌，這也正是我們